

陈泽泓：三十载沉潜，做一本“存真求实”的人粤人物传记书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
图/羊城晚报记者 刘志勇

近日，一部为“入粤者”立传的83万字厚重之作——《广东人物传·入粤卷》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是方志学家陈泽泓。

已近耄耋之年的陈泽泓，当过印刷厂的工读学生、海南兵团知青，在学校站过讲台，在机关批过公文，在工厂摸过机器。大学中文专业函授毕业，年近花甲方入修志一行。“我只有一个本事，那就是‘业余学习’的能力。”陈泽泓自豪地说。

从“半路出家”时立志“只研究物，不研究人”，到三十载沉潜终成八十万余字人物长卷；从“存真求实”的修志笔法，到“当官要为民做主”的古今政绩观审视，陈泽泓道出了一部人物传背后的史心、史识与史德。



以辞典体例撰写人物传

羊城晚报：《广东人物传·入粤卷》被誉为“首部广东入粤人物百科全书”，您怎么看这一评价？

陈泽泓：首先要说明，这一说法并非我提出，并不准确。我将《广东人物传·入粤卷》定位为“群体人物传”，以入粤为主题的群体人物传早有先例，我与李小松先生1994年合著的《历代入粤名人》便是早期著作，因此不能称新作为“首部”。若论开拓性，本书的准确定位，应该是“首部辞典式入粤人物传记”——讲究条目体例，兼具真实性、学术性与权威性，以辞典体例撰写人物传，标准更严苛，也更能凸显本书的体裁特色与学术价值。

羊城晚报：张荣芳教授在序言中评价《广东人物传·入粤卷》比《历代入粤名人》“更上一层楼”，提升是否主要体现在学术性方面？

陈泽泓：旧作《历代入粤名人》共72篇，立传75人，约35万字；新版《广东人物传·入粤卷》增至188篇，立传189人，篇幅达80余万字，内容体量更为厚重。核心提升在于编写理念与学术规范。《历代入粤名人》文学色彩较浓厚，《广东人物传·入粤卷》侧重学术价值挖掘，史料搜集范围大幅拓展，以正史、地方志、碑铭、传主文集及日记为核心，兼采历代权威人物传记。从体例上，《历代入粤名人》无引文出处、参考文献与脚注，学术支撑不足；而《广东人物传·入粤卷》补齐注释、引文标注与参考资料，坚守“不作无本之论、不说无据之语”的原则，做到言之有物、论之成理。

羊城晚报：“入粤人物”如何界定？

陈泽泓：“入粤人物”特指籍贯非广东的外来人士，即便长期在粤生活仍归入此类。如南越国赵佗坐镇岭南六十年、年逾百岁，但祖籍河北，依旧列为入粤人物。本书界定依照现行广东行政区划，历史上曾属广东如今划归广西、海南等地的人物，也纳入收录范围。

羊城晚报：您在后记提到，将在《广东历代名人传略》及续编基础上整理粤籍人物传集？

陈泽泓：三十年前我出版《广东历代名人传略》《广东历代名人传略续集》，两部合计六七十万字。《广东人物传·入粤卷》问世后，我计划依托前作编撰《广东人物传·广东卷》，专门收录粤籍本土名人，与“入粤卷”形成完整互补。

古之循吏体现的价值坚守

羊城晚报：您有没有统计过，这部书的撰写中使用了多少方志类的材料？

陈泽泓：撰写过程中，我主要使用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《广东历代方志集成》，这套书收录了433种历代方志文献，涵盖省通志、府州志、县志三大类别。在查阅、选录时是有分层的：省志、府志、县志层级不同，收录人物的标准也有高低之分。能在省志中留名的人物，影响力层次更高；而在县志中被认为值得一记的人物，按照本书的容量，就不一定能全部收录。

羊城晚报：本书为何大量收录地方官员？

陈泽泓：书中大量收录地方官员，是因为他们体现了一种正确的政绩

观。古今政绩观的标准固然不同，但应当存在通用的、正确的史观。古代有“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”之说，正是传统史治的价值坚守。旧时百姓为良吏敬献万民伞、离任时含泪相送，甚至集体上书请求留任，那些知府之所以能在地方留名，确实是民心所向。循吏中如宋璟这般治政有功却拒立碑颂德的官员，坚守为官本心，值得后世推崇。

羊城晚报：挖掘方志中“名气不显”的循吏（“好官”）有何价值？

陈泽泓：原因有二：一是人物互补，正史收录的岭南人物极少，而方志正好补充了大量正史无传的基层官吏和地方名士；二是事迹补充，正史往往只记核心履历，方志则详细记载了基层人物的政绩、教化贡献和民间事迹，这些都是正史中缺失的历史细节。

“史从论出”与“论从史出”

羊城晚报：从“入粤者”的视角可以看到岭南文化怎样的形成过程？

陈泽泓：包容性与多元融合是岭南文化最鲜明的特质，这种融合主要来自三大块：一是本土的百越文化，这是岭南文化的底色；二是岭北各种地域文化的影响，不能简单归为中原文化、河南、山西中原文化之外，江南文化、楚文化对广东影响深远；三是海外文化，这是广东面向海洋的天然优势。这三块融合在一起，才形成了完整的岭南文化。从“入粤者”这一视角，才能真正看到岭南两千年文明交融的状态：朝代分布上，唐代后入粤人物数量持续攀升，清代达63人，越至晚清近代，入粤人物对

岭南社会、文化的影响越深刻，并非在岭南文化成熟后便趋于弱化；籍贯来源上，宋以前入粤者多出自河南、河北，明清以江浙人士为主，地域来源广泛，带动岭北多元文化入粤交融；海外交流层面，本书收录9位外籍人物，来自美国、印度、意大利、英国等多国，以宗教人士居多，他们在医疗、教育领域推动了岭南社会近代化进程。岭南文化的包容性、多元性，离不开历代入粤人士的贡献，他们是岭南文化形成与发展中功不可没的见证者与参与者。

羊城晚报：您最初研究古建筑，后来为何转向入粤人物研究？

陈泽泓：做这一研究，纯粹是“无心插柳”。早年函授毕业，空闲时间多了，我想做点研究，便给自己定了个规矩：“只研究物，不研究人；只研究死物，不研究活物。”当时我觉得研究人太复杂，研究物肯定容易些，于是便铆足劲在做古建筑。转折发生在1992年。当时李小松先生患病，邀请我续写《历代入粤名人》一书。我与李先生是忘年交，不好推辞。在他37篇约10万字书稿的基础上，我续成至72篇，共20万字。后来，执行主编岑桑先生来信说：“历代入粤名人书稿，文笔和内容都较弱。”——这话讲得很委婉，实际上就是不过关。他接着问：“不知您肯否认真修改一次。”我只能勉力而为，通过修订、重写、新作，最终成稿82篇，为92人立传，总计35万字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找书不容易。为了查资料，我老往省地方志办公室跑。资料处处长经常见到我，便说：“你这么用心，要不要调到我们来？”就这样，我被调去了省地方志办公室，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方志整理、编纂和研究工作。所以说，这事是“歪打正着”，但这些年来受到了熏陶，深觉治学之意义深远，自当尽心尽力。



陈泽泓

羊城晚报：在史学研究上，有“史从论出”和“论从史出”的说法，您怎么看？

陈泽泓：“史从论出”还是“论从史出”，这个问题从字面上看很简单——没有史实，怎么能得出结论？按这个逻辑，应该是“论从史出”。但我这些年做地方志，慢慢有了新的体会。我想说的四个字是“实事求是”——“事实”是还原事情的真相，找出那个“实”；“求是”是在此基础上找出真理、规律、道理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史论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无疑是“论从史出”；但在传统正史中，也很难存在“史从论出”的问题。地方志必须“存真求实”——老老实实把事情真相写下来，任务就完成了，不需要进一步提炼出“是”。具体到《广东人物传·入粤卷》的编纂，我是用地方志的原则，做一本“存真求实”的书。



在雅典遇见孔子

二千多年前，苏格拉底在雅典集市上与人交谈，探求真理，即所谓的“苏格拉底对话”，或“苏格拉底辩论”，经由柏拉图书写，成为西方哲学求真传统的基石。

我们在雅典的这几天天气都不好，更加让人感到整个城市都是一片废墟景象，在这废墟最中心的位置是苏格拉底曾经漫步的古代市场Agora。我们决定去看市场的时候，沿着一条较为古老的路向山上走，但不是卫城的方向。首先经过哈德良图书馆，哈德良是古罗马五贤君之一，在土耳其和雅典都有不少他的遗迹。图书馆如今仅存轮廓，但依然可以想见当年曾是学术重镇。

再往上走到古罗马的市场，只余三根柱子的大门占满天空，这时注意到雅典的风——柱子不动，而旁边的橄榄树犹如暗绿色的波涛涌动，雅典的风是橄榄树的形状。

走上人迹罕至的土路，远远看到一座神庙，正在拍照片之际，一位雅典大娘停步问我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？我说是Agora，她说这是古希腊人的Agora，而不是罗马人的Agora。没想到两千年过后，雅典人还有这么强的民族自尊。这个Agora，就是古代雅典鼎盛时期，苏格拉底与人论辩之地。

在旷野般的废墟中，意外看到了孔夫子和苏格拉底两座青铜塑像，相向而立，看说明是中国政府的赠礼，这是跨时空的交流吗？青铜塑像周围一片苍凉的景象，阴郁的天空下，远远看到卫城遗迹，只听风声吹过，站在空无一物的集市中，犹如站在历史的尽头。



50年前的“溜变蛋”

1976年1月，我在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培训班毕业，留系工作。春节过后，我参加中文系函授教学小组，赴安徽阜阳从事上海知识青年函授面授教学工作。

课余时间常在阜阳街头闲逛，在吃食摊上发现一种小吃，把皮蛋剥壳后切成小块，放入沸油煎上几分钟后取出，加些佐料后即可食用。皮蛋这种吃法，我闻所未闻，品尝了几次，觉得又新奇又可口，很喜欢。

我以后再到过阜阳，但我记住了皮蛋这种别致的吃法，并将之称作“油条皮蛋”，当然，这是上海话的说法。光阴似箭，五十年很快过去。日前应邀到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参加“谷兴云教授日记和师友信札整理和研究”工作坊，不仅与91岁高龄、精神矍铄的鲁迅研究专家谷先生阔别聊叙，也想起了五十年前吃过的“油条皮蛋”。

于是，我不揣冒昧，向工作坊主持人提出，想再去尝尝“油条皮蛋”。没想到的是，阜阳的同行，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者，乃至谷先生本人，都不知道“油条皮蛋”，不但没吃过，听都没听说过。

这使我大吃一惊，难道我记错了？待我回到上海，阜阳师大金星教授传来了喜讯。据《阜阳味道》记载，阜阳确有一道名菜“溜变蛋”，烧法与我记忆中的“油条皮蛋”相似，这就对了。看来“溜变蛋”就是“油条皮蛋”，只是已经“登堂入室”，成为阜阳的一道名菜了。

下次如再到阜阳，一定要去品尝。



槟榔之害

槟榔致癌风险高、损害口腔健康与消化系统；然而，孟加拉全国1.72亿人口中，仍有近三成沉迷其中，他们多是农村里文化程度不高的中老年人。

我在孟加拉结识的朋友马祖德尔，谈起家中一桩惨事时，语调仍带着难抑的悲伤：“我的三位至亲，都是被槟榔直接或间接夺去性命的。外祖父因长期嚼食槟榔而患上口腔癌；他去世后，母亲便严禁父亲再碰槟榔。可父亲已经嚼食多年，积习难改啊！为了避免与母亲正面起冲突，他只能在夜深母亲入睡后偷偷嚼食。有一晚，他坐在沙发上，正把裹着槟榔果的茎叶送入口中，忽然听见母亲起身的动静，他急忙躺下，结果，槟榔果滑进咽喉，堵塞气道，当场噎死。母亲深感内疚，逢人便说：‘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该千方百计地阻止他！’一年之后，她也在抑郁中离世。槟榔，害了我们一家三条人命啊！”

在首都卡达的槟榔批发市场，一筐筐茎叶、一箩箩槟榔，铺天盖地，堆积如山。可就在这繁荣景象的背后，人们却对长期嚼食槟榔的恶果视若无睹。

槟榔之害，不逊于孟加拉虎！



不要成为“老登”

去年7月应广州一所中学邀请，给刚升入高中的孩子们做一场通讯写作的讲座，进行思维启蒙，让他们在思维上适应新阶段的写作要求。这场分享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家长也一起参加。讲座结束后，不少家长都加了微信，一位家长留言说：“听过很多讲座，你是最合我们胃口的一个，不因别人实力不济，而是我们眼光太高了。”

倒不是想拿这个留言来炫耀，让我受到触动的是那句“我们眼光太高了”——这是一个事实，因为我也曾是家长，当我换个身份以家长角色坐到孩子的教室听分享时，确实会对一切带着挑剔的眼光：你的观念配得上这届年轻人和家人们吗？

虽然从业已经二十多年，写过无数文字，每年上百场讲座，可每次写文章、上台、作分享的时候，这种“现代人眼光太高了”的压力总会支配着我，让我保持着一种紧张感，我的思考和观点配得上读者和听众吗？这种接纳与欣赏的磁场对一个“讲者”非常重要，如果大家目光游离，一脸茫然，低头看手机各忙各的，死一般的沉寂，讲台上的人是根本站不住的。

感到幸福的是，我的讲座，我的文章，我的“时评中国”系列，都得到了读者热情的反馈，这种反馈让我看到，我没有落后于这个时代的观念水位，没有成为让年轻人反感的“老登”。



“从前慢”

木心说过：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，马，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

交通工具改变了时间的流速，更改变了人与人物理与心理的距离。想起绿皮火车时代，我人生第一次“公务”出差，是跟印刷厂的一个师傅去济南的出版社送在上海打好的“纸型”，那时还是铅字印刷。返程时，因为当时济南没有始发车，山东朋友派出一个乘警，领着我从纵横交错的轨道间跳跃，攀爬站台，上了绿皮火车，安排我坐在餐车里等空座位。

正焦虑的时候，忽然看见列车停靠泰山站，于是，我就下了车。正是傍晚，夕阳西下，炊烟袅袅，有位山东大娘热情迎过来，挽着我，说，去我家的店，保准吃得好好住得好。结果，是一个简陋的小黑店。我拿外套裹住潮湿的鞋子熬了一夜。

第二天凌晨，拿着一张地图，一根竹棍，去爬泰山。很幸运，看到太阳从云海里跃出……下山的窄窄的台阶走得腿酸，看旁边的人拎着行李拎着幼几，自己就拿着钱包和一根棍子。到了半山腰，两位男士坐在路边喘息，问，上面有什么？我说，远远近近，很多刻在大石块上的书法。那两个人想了一会儿，说，你也算是帮我们看过了，一起下山吧。结果，按照我看到的地图上的提议，我们走的盘山公路，沿途经常抄近路出溜下小山坡，还进了一个农民小院，在两只大狗看护下喝茶。到山脚时，腿已经不会打弯，感觉比下山累多了。

在旅店结了账，再上了一辆过路去上海的绿皮火车，凌晨四点到南京。天还没亮，也不能打扰人家，安全的地方只有火车站，候车室要检票才能坐在里面，于是，看见站前有个小馄饨摊子，为了座位，只好买一碗小馄饨，再续一碗，耗到天渐渐亮起来……



1926，群龙无首

《东行漫记》是邹德怀的第二本书。他之前花63万元买了一个瑞典企业家的三本相册，里面记录了他1926年10月瑞典皇太子在中国的旅行过程，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菜单、门票、说明书。照片出自多人之手，有专业摄影师，有王子身边的随从，还有购买的纪念照等。

邹德怀这本书里有一段关于1926年的介绍，我觉得挺有意思：“1926年1月，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冰释前嫌，他们共同讨伐冯玉祥的国民军。3月7日奉系多艘军舰在大沽口北岸登陆，国民军将其击退，并用水雷封锁，6月12日下午，日本派军舰掩护奉军进入大沽口，大沽口从此被封锁，日本、英国、美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比利时、荷兰、西班牙八国以荷兰公使为代表进入最后通牒，要求国民军停止大沽口到天津一带的战事，并且撤出大沽口海面的水雷。”3月18日中午是48小时最后通牒的截止日期，随即爆发了“三一八”惨案。

“三一八”惨案的结果也很耐人寻味，一个是刘和珍等47人当场遇难，第二是北京庚子赔款委员会主任、北京图书馆馆长纷纷南下，包括鲁迅也在1926年离开南下厦门。

《东行漫记》里有个细节很有意思：瑞典皇太子去参观北大，那时候北大空无一人，因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在上海搞革命，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躲在六国饭店不敢出来，北大国学院的很多教授都被南方挖去，所以北大没有人接待他。1926年，群龙无首。

●随手拍 文/图 任松岭

前海阳光



周日，深圳前海桂湾公园。蓝天白云下，鲜花怒放。母亲牵着我的小儿子，沐浴在阳光下，畅享深圳“千园之城”建设带来的美好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：ycwbwby@163.com